先锋的沉寂与绽放

覃新菊,刘衍永^①

(吉首大学 文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 先锋文学走过了三十年的曲折道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带着西学滋养盛大出场,又在强大的外力与自身诟病中于九十年代初集体转型,陷于沉寂。这些年来,他们坚持地下耕耘,探索突围与创新,终于在诺奖、鲁奖、茅奖里绽放。这一历程昭示着文学自身发展的肌理:先锋文学经过山重水复的沉潜与磨砺,一旦将笔力转向脚下的大地,从精神内力的层面发问、求索,与中国现实处境相结合所爆发出来的魅力、实力与影响力,是相当惊人的。

[关键词] 先锋派;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沉寂与绽放

[中图分类号] I10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6)06-0097-05

先锋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诞生以来,一直备受争议。学界认为,在90年代集体转型,走向衰落。就在回望与反思先锋文学三十年之时,2015年,第9届茅盾文学奖出炉了,其中竟有两位当年的先锋作家荣获奖项,他们是创作《江南三部曲》的格非与《黄雀记》的苏童。联系2014年第6届鲁迅文学奖,格非凭借《隐身衣》荣登榜首,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大圆国人文学之梦,由此话题产生了逆转:先锋文学由沉寂转为绽放了。

一 先锋的出场与转型

当代文学中的先锋派起始于1985年前后,这一时期,莫言、马原、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苏童、北村等作家,先后发表了他们具有先锋文学气质的重要作品,马原《冈底斯的诱惑》、格非《褐色鸟群》、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残雪《山上的小屋》、孙甘露《信使之函》、余华《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苏童《妻妾成群》等等。到2015年刚刚30年,学术界策划了一场“先锋文学三十年”的研讨活动,随着三奖——诺奖、鲁奖、茅奖的落地,先锋文学30年这一话题,便再一次成为提振文学的时髦话题。孟繁华《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周年》^[1]认为,这些小说改变了中国文学长久不变的“一体化”状况,重建了文学秩序,“形式的意识形态”开始统治中国文坛(“统治”一词

使用得有些过量),这一场具有“地震级”的文学潮流,不仅改变了小说的写法,开启了小说写作的另一种可能,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们与文学的情感方式和感受方式,丰富了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和认知。当代文坛,是否受过先锋文学的洗礼是大不一样的。

这波作家,他们大多是60后,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并且大都生活在南方。而关注他们,给予文学理论与流派命名的批评家们大多集中在北京,生活在学院,像李劫、吴亮、陈晓明等,也许作家们未必有强烈的分离与断代的自觉意识,也未必系统接受过后现代主义的精神营养,可能就是这波批评家们的界定,使“先锋文学”被贴上了“后现代主义”标签。批评界的拔高极大地给予了这波初生牛犊创作上的信心,施战军《先锋写作:方位调整与精神再生》开篇就写下:“十年前的先锋,意味着对经典的现实主义写作套式的反叛,同时,也意味着对技术主义写作路数的权威性的建构。”^[2]相应提出了两个关系,一个是先锋与现实主义的尴尬关系,一开始就以反叛现实主义的姿态出场,后来似乎又遁入其中。一个是与形式的关系,关于先锋与形式的迷障问题,又相应引发一系列的追问与思考:如何理解先锋派的现实感或现实意义?先锋派的意义只是形式主义实验的意义么?先锋派的形式只是纯文学的吗?

[收稿日期] 2016-1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作家旅行活动与文学关系研究”资助(编号:15CZW039);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视觉文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形态的变迁研究”资助(编号:15C1145)

[作者简介] 覃新菊(1967-),女,湖南张家界人,土家族,吉首大学文学院教授。

^①南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然而,大家知道,先锋文学似乎突然消失了,而且还可以具体落实在某个时段某个强大的外力干预。何平从文学刊物这个文学活动的主体性存在角度,把脉先锋在文学市场上的演变,指出先锋文学大约在1989年7月左右,“季节在一夜间/彻底转变”(王家新诗句),呈“断崖式的强制性中断”,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被一种启蒙运动受挫的悲情所暗示和劫持”^[3]的感觉,以致后来各大刊物试图通过“重塑70后”以及“80后”的“独立写作”,其目的无外乎是重整文学创新与生机,结果发现,先锋文学的“先锋姿态”,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犹如“一根刺”(韩东语),这个隐喻源于对一个潜伏着的假想体制的压抑和反抗,也就是说,没有相对的文学秩序的腐朽,就没有这“精神贵族”的超拔与索离。

通过对当代先锋文学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的集体转型及其困境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先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思潮,能够浩荡地迅速开始,却在1990年后,不再坚持最初的写作,出现了集体转向,大致有两种:一是转向更加偏执的“个人化写作”,推崇私人话语;二是拆解了之前的庄严叙事风格,改掉绝望无奈的悲情,代之以充满希望与欲望的喜剧书写。其原因大致如下^[4]:

第一,与接受主体距离太大。中国的读者,紧贴生存与现实,是不关心艺术探索与革新的,如何将艺术探索与现实发问熨帖在一个合适的层面,便自然成为先锋的使命所在。

第二,商业化的影响。面对大众文化、快餐文化,读图时代,网络文学的挤压,先锋文学如何在夹缝中凤凰涅槃,成为先锋突围的一个方向。

第三,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他们深刻地探索人性的真相,结果发现,人性的内核是虚无,人生的结局是悲凉,直抵人性的黑暗与灰色地带,容易引起社会的精神恐慌。

陈晓明通过辨析与反思先锋文学30年,将转型的原因归结为90年代这个特定时代。他提出,90年代的中国如此特殊,以至于它本身就是混乱、解体、变异、转型和重构的时期。相比之下,80年代左右是对峙的,历史方向感很清晰,其终结也干脆利落,但90年代没有方向,所有的东西都不确定,没有现实感,没有确定性。别说先锋派,90年代本身就是个旧有的一切消逝的时代,连80年代的遗产也必然消逝,从而得出结论:先锋派在90年代消逝,不是先锋派水土不服,也不是中国曾经的先锋派势利或无能,而是90年代本身是如此的特殊,它没有存在的根基。先锋派的终结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

它确实是20世纪的独特现象。应该说,这种反思立足于特定的一个时代,属于一个独特的发现。文章的结尾虽然是例行公事,但值得揣测,他说:“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耗尽了先锋派当年的锐气和意义,但是文学还在继续,今天的中国文学可能又面临一场变革的机遇,这个时代的先锋或许更值得期待。”^[5]话语里包含着某种希冀,先锋也真如他所愿,期待实现。

话说回来,20世纪90年代,先锋集体解散、转型。余华写作《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似乎才浴火重生,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先锋走向了现实主义与底层写作,被强大的现实主义所收容,似乎才有出路。其实从中也可以看到,对技术的探索与对现实关系的兴趣、与实实在在的生命意识相握,是先锋文学自身发展到一定地步的一个调整与成熟。单面性的超越传统现实主义律条与单面性的超越技术主义,在80年代中期与90年代前期已经宣告完场,他们未来的道路,自然不是为技术而技术,先锋文学的归宿必然是通向精神的探秘,在“由技返道”的中途,能够保持文学向现实发问的意识与能力,才能破茧成蝶。

二 先锋的特点与突围

一讲到“先锋”这个概念,自然与法国作家欧仁·尤奈斯库所论述的先锋派概念相似,是指“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现象”,是一种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在先锋作家的创作谈和系列言论里,我们常常会发现一长串外国榜样作家的名字:博尔赫斯、卡夫卡、杜拉斯、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等等,似乎中国先锋技术与精神的舶来品质铁证如山,认为“起源于浪漫主义乌托邦及其救世主式的狂热,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本质上类似比它更广泛的现代性概念。”^[6]格非的所有创作,都与这个乌托邦有关,《人面桃花》中的陆秀米、花家舍,一方面努力建构与寻找,另一方面又直面它“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过程,轰隆隆大厦将倾的意味。牙科医生的余华每天面临的都是“啊……”张大的烂嘴巴,可能他的办公室在高楼,坐的又是临窗,扭头看到作家在街头自由穿梭,就弃医从文了,他坦言他的创作直接受西方当代作家博尔赫斯等的影响。这也是80年代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西学东渐的自然结果。这波作家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高等学院教育与西方文化熏陶,表现出与西方接轨的一种努力与渴望。我们太落后了,把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糟蹋得一塌糊涂了,直到近些年来,随着我们

综合国力的提升,民族的强大,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才越来越得到足够的重视。先锋作家们也感应到“拿来主义”之后,自然要为中国的“文化输出”做一些贡献,在创新冲动的驱使下,先锋作家笔下的中国特色是越来越明显。这也正好印证了张清华关于先锋文学的回答:先锋文学不是舶来品,它“源于文革时期地下状态的启蒙主义写作”,“在当代中国首先是本土性的范畴”,并且“是在20世纪80年代紧张的处境之中诞生的”^[7]。通过对这波作家的代表性文本的阅读,可以感受到先锋文学思潮的总体特点:

第一,叙事方面更侧重于“怎么说”。由“说什么”转移到“怎么说”,形式主义倾向是其第一表征。苏童《黄雀记》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事风格和节奏,故事并不复杂,就是一桩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分为3章: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3章的标题暗示了3个不同的叙事视角,寓言式的写法,唯独却没有冬天。井庭医院、水塔、绳子、丢魂、找魂等意象密集,意味深长。

第二,语言上反讽手法的普遍使用。“反讽”是语言与语言、语言与意义,意义与本义之间可能出现的各种脱节与矛盾现象,格非《山河入梦》开篇写道:“谭功达神情阴郁,心事重重。他的膝盖上摊着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那是一张手绘的梅城行政区划图。他不时地用一支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可谓庄严之极,一个政治英雄形象脱颖而出。接下来写道:“地图下面,秘书姚佩佩的小腿随着汽车的颠簸,有节奏地磕碰着他的神经。”便是欲望化的书写,这一反差交织,便产生了明辨的反讽效果,而作家自己努力克制,不露半点神情。

第三,中国特色明显化。先锋的“中国含量”,先锋的“江南因素”,越来越引起评论界的关注与重视。“江南三部曲”是著名作家格非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求索,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演变轨迹。江南三部曲分别是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他说他是按历史的线索进行的规整性写作,有意识地延续《史记》传统。莫言获诺奖的授奖词里有“让人想起福克纳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他自己是不认同的,在《也谈鬼怪妖魔》里也坦言,他是向老祖宗蒲松龄学习,做一个捋着白须,油灯下讲故事的人。因为模仿不等于创新,模仿不可能走向世界,莫言自有他的特色,而且就是中国特色。

第四,主体意识方面,具有明显的个性化创作与

设计。金宇澄《繁花》是一部地域小说,人物的行走,可找到有形地图的对应。这也是一部记忆小说,60年代的少年旧梦,辐射广泛,处处人间烟火的斑斓记忆;90年代的声音犬马,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水席,叙事在两个时空里频繁交替,传奇迭生,延伸了关于上海的“不一致”和错综复杂的局面,单单没有轰轰烈烈的80年代。如何理解呢?也许“江南语态,优雅野心”、“古典笔意,内里先锋”、“繁花落尽,底色苍凉”^[8]具有一定的概括性。

中国的先锋在80年代中后期跻身文坛,在90年代初渐渐隐匿,随后是沉寂、修炼还是转型呢?先锋不见容于社会,也不见容于他们的艺术同行,只有很好地实现转型,才有可能突围与复活。可是,如何突围呢?

(一)突围应朝向包容性,学会在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大众文学的夹缝中生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文学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冲开一角,后来差不多是俗文学不给先锋文学留空间了。然而,从文化结构还是文学结构上,先锋文学所代表的是精英和核心的部分,他们所保持的探索精神与自由精神,正是当下“中国梦”里创新资源的文化保障,作为遗产的先锋给出了突围的榜样,那么作为精神的先锋,理应继续在夹缝中前行,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二)突围应体现社会性。从先锋走向故事,回归民族精神,从以往的自恋朝着社会、民族、历史方向发展,先锋作家大胆地对创作内容进行开拓,在充分吸收西方营养之后,向着本土化发展,借着历史的碎片,拾起对现代主义的执着,在物质经济日益迅猛发展、精神情操却日渐缺失的今天,寻找精神的寄托与心灵的真相,这无疑是在内容上向更深层次进行探索,进行追问的重要表现。

(三)突围应坚持创新。李佩甫的《生命册》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路子,个人命运的流转与时代大潮相起伏,尤其是知识分子完成的身份转变与思索,成为本书的厚重与精彩,代表着乡土文学的最佳成就。而先锋,是追求“有意味的形式”的,他们能够发现问题在哪里,我们需要前进的方向又在哪里。余华《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里谈到:“他们著书,不像是出自一个深刻的信念,而像是找个难题锻炼思维。”^[9]由于人类感觉的有限、智力的有限以及生命本身的有限令人辛酸与悲哀,于是,衍生出怀疑与对思维的锻炼。先锋文学一直保持着对未来的探索与命运的怀疑精神,那么文学要创新,还得回到先锋这里来。

三 先锋的绽放与未来

铁凝在第9届茅盾文学奖致辞时说,这5部作品没有辜负珍贵的信任,每一部都如同一盏明亮的灯,照亮了这边风景,每一部都凝聚着作家深厚的体验与精湛的功力,在漫长的时光、寂寞的劳作中淬炼而成,他们拓展了汉语文学的精神空间,标记着2011到2014年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辉煌成就。这些作家是皓首穷经,甘于寂寞,耐心淬炼,终将一头花白换得这至高的荣誉。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17年的创作历程,本意是致敬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和司马迁“明是非、正人心、淳风俗”的叙事抱负和写作使命,我们要追问的是,这样“古朴有余”的写作还是先锋吗?是不是对当年专注于小说形式和文笔的反思与逆转呢?通过阅读发现,他对历史的书写姿态并不能简单地比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传经验,他也无意于显现我们熟悉的家族三代接力式的历史壮阔,相反,叙写之间活跃着对“桃花源”、“花家舍”、“乌托邦”的反讽与解构,人物的使命与命运之间也呈分裂与反差的路径分布,路侃疯癫走失,王观澄不得好死,张季元情欲纷扬,陆秀米装疯失语,展示出这群整日沉湎于桃花虚境的知识分子可笑又可怜的图谱。夏烈专门用解构主义的两个概念“反讽”和“延异”^[10]来指涉“江南三部曲”的历史意识与精神世界,有以下4个场景与细节可以佐证:第一,《桃源图》是为贗品的注脚。第二,“花家舍”经过王官城20年的经营沦为无法控制的江湖土匪窝。第三,秀米的乌托邦实践同样沦为悲凉而惨败。第四,人物婚姻的下嫁繁衍。这些都是对历史中被美化的“乌托邦-桃源”解构所做的解剖与厘清,格非直接面对知识分子本身的先天不足,比如迂阔、隔膜、偏执以及后天破损的镜像,在充满反讽与隐喻的叙事中,历史被解构了,人物被解构了,庄严起来的,是对传统历史轨迹的怀疑和警觉,是对知识分子心史的解剖与自省。

《黄雀记》是一部标准的现代小说,很多意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值得揣摩。作为苏童一生的写作地图“香椿树街”,在《黄雀记》里增加了时间维度,就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这一强大的历史潮流渗透到了香椿树街。保润的父母将无病的祖父送入精神病院,为的是把房间腾出来租给别人,柳生家靠卖猪肉而发家致富,马戏团也风风火火了一阵。尤其是“掘金事件”与祖父“丢魂”、“寻魂”的闹剧,影射出混沌不明的市侩乱象与利欲熏心的精

神变态。而保润的“绳子”绝活不但不能捆绑世俗异己,反而成了自己获罪入狱的帮凶。“施洗之河”与“善人桥”上仙女得到救赎了吗?不知所终。“保润的春天”里,“这个季节充满着圈套,所有圈套都是欲望编成的”,十年牢狱,时间还是锁定在内心的青春混沌时期,没有成长,没有变化,只有纠葛,只有欲望的流动与演变,以致与仙女“跳小拉”成为了他年少爱情的浪漫寄寓和青春时光的精神绝响,最后以毁人自毁的极端方式完成了青春的祭奠。柳生也是一样,水塔事件之后,他一直生活在灾难包围之中,虽然发家致富了,犯罪的青春往事一直潜藏在心狱,直到仙女以白小姐的身份回来,才发现自己一直生活在快乐的假相中,真相则是连绵不绝的阴影,然而,长期的赎罪也没能躲得过命定的报应惩罚。小说围绕保润、柳生、仙女三个中心人物构建出了复杂的三角关系,从最初的注视到互为羞耻,到最后互为地狱的存在,相互折磨,相互限制,无法超越与摆脱,正如萨特所言:他人即地狱。“怒婴”的问世,带着三角关系中无尽的羞耻与罪感,控诉着异化的人伦与变态的世相。

先锋文学实践不仅为文学的向内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本体形式,同时也使文本自身体现出形式的意义。先锋文本一方面为文学的纯粹性确立了标准性的叙事方法和手段,另一方面也建立起维护文学纯粹性的精神传统。“先锋散落后的精神碎片”^[11]昭示着文学自身发展的肌理:技术主义的历练,经过山重水复的沉潜与磨砺,一旦将笔力转向脚下的大地,从精神内力的层面发问、求索,与中国现实处境相结合所爆发出来的魅力、实力与影响力,是相当惊人的。

是先锋让我们更加明白,文学毕竟是文学,而不是现实,就得有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与探索的自由空间。文学是表现,而不是再现。那里已经有一个现实,这里再来一个现实,那要这个现实干什么?!文学可以走得远一点,与现实保持一种超拔的关系。不过,开始时先锋离大众也太远了一点,当然也被接受大众所疏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可能如叔本华的比喻,两只刺猬在冬天里抱团取暖,近了,扎着自己也扎着对方了,远了呢,又寒冷寂寞难耐,只有不断调适着彼此的距离,才能适宜无伤的相处相存。这个道理,对于个性独异的人与人之间是如此,对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面对先锋的大满贯,我想不要忘记他们这么多年的沉寂与沉潜。原来,他们并没有解体,没有消逝,没有终结,正如“树的理论”,我们没有看到树的

发芽,开花与结果,不是它不作为,或移情别恋,而是扎根地下,深入黑暗,往地底下生长哩!然后才有后来的满树金华。面对未来,我想要表达的是,当人们指指点点,众说纷纭的时候,优秀的作家始终坚持用作品来说话。而且,先锋文学本身是面向未来的文学,当今又是一个转型与变革的时代,强调创新的时代呼声更加渴盼先锋参与唱和,先锋作家们也正值半百年华,对于创作来说,刚刚走向成熟,我们有更充足的理由期待文学变革的使命再一次需要先锋来担当。

[参考文献]

- [1] 孟繁华.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纪念先锋文学三十周年[J].南方文坛,2015(3):13-14.
- [2] 施战军.先锋写作:方位调整与精神再生[M]//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中).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105.
- [3] 何平.“先锋文学”,止于“先锋姿态”[J].小说评论,2016(6):35-41.
- [4] 江涛.先锋文学落幕与作家集体转型的原因探究[J].群文天地,2012(3):270.
- [5] 陈晓明.先锋文学三十年:辨析与反思[J].南方文坛,2015(3):10-12.
- [6] 洪治纲.先锋文学与形式主义的迷障[J].南方文坛,2015(3):5-9.
- [7] 张清华.关于先锋文学答问[J].文艺争鸣,2016(3):56-59.
- [8] 董雷.论金宇澄《繁花》的传统性与先锋性[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5(1):66-72.
- [9] 余华.人类的正当研究便是人[M]//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96.
- [10] 夏烈.格非“江南三部曲”的历史意识与精神世界[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2):1-10.
- [11] 陈阳.先锋散落后的精神碎片[J].文艺研究 2005(10):19-24,166.

The Silence and Blossom of Vanguard literature

QIN Xin-ju, LIU Yan-yong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Vanguard literature has followed a tortuous road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It had a grand appearance with western nourishes in the mid of 1980s, then it felled into silence and transformed under the powerful external forces and their own criticism in early 1990s. Over the years, it insisted on developing, exploring, making innovation in reality. Finally it had a big blossom in the Nobel Prize, LU awards and MAO awards. This process indicates the na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If Vanguard literature turned the pen at the foot of the earth, asking questions into people's spirit, combined with the real situation in China, and went through all the sinks and hones, it would burst out astonishing charm, strength and influence.

Key words: Vanguard literature; the Ninth MAO-dun Prize for Literature; silence and blossom